

《红岩》·罗广斌
·中美合作所

刘德彬 编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本泉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刘德彬 编

《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83 千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

*

ISBN 7-5366-1368-7/I·250

定价：3.05元

内容简介

你想知道“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幕吗？你想知道反映“中美合作所”狱内革命斗争的著名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经过吗？你想知道《红岩》作者之一、国民党兵团司令罗广文的弟弟罗广斌，怎样和家庭决裂走上革命道路的曲折故事吗？……请读本书。

书中，你将听到罗广斌《话说“中美合作所”》的翔实介绍，马识途讲述罗广斌在青少年时代走向革命的曲折生动的故事，王维玲谈《红岩》写作前后的经过……娓娓的回忆中蕴含着珍贵的史料，有可读性，也有资料价值。

目 录

话说“中美合作所”	罗广斌	1
生当作人杰		
——记罗广斌在“中美合作所”	刘德彬	30
罗广斌传略	穆一歌	59
我的悼念	沙汀	66
绝不许悲剧重演		
——悼念罗广斌同志	曾德林	69
忆罗广斌	廖伯康	74
公子·革命者·作家		
——回忆罗广斌	马识途	80
他，还活在我们中间……	杨益言	131
怀逝者		
——年轻的广斌同志战斗的足迹	陈家俊	150
忆广斌	向洛新	159
罗广斌在长寿湖	曹靖	165
他是一团熊熊的火		

——记罗广斌同志	艾白水 176
怀念爸爸罗广斌	罗 加 184
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	
——略谈《红岩》的写作	罗广斌 191
走向成功之路	
——记成名之作《红岩》的诞生	王维玲 197
罗广斌与《红岩》	黄 伊 259
人·地·书的历史	
——读《〈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	
	余之思 279

罗广斌

歌乐山下的魔窟

我今天讲的是重庆解放以前，在集中营内一些革命先烈的斗争事迹。在我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中，若干年来牺牲过许多革命先烈，牺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革命先烈，是全国革命先烈中的一部分。

中美合作所就在沙坪坝、磁器口附近，歌乐山下面。远在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政府搬到了四川，把重庆命名为它的陪都。蒋介石也住在重庆。和他们的政权到达重庆的还有许多特务机构，军统特务机构是其中最大的

(注) 罗广斌自1949年11月27日从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大屠杀中越狱脱险后，曾先后在重庆、成都等地作过成百上千次报告，揭露中美合作所罪恶，宣扬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受到广大青年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本文是他六十年代在重庆某军事院校所作报告的一次录音，由他的战友、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和长篇小说《大后方》的作者之一刘德彬整理成文。

一个。军统当时就选中了磁器口这个地方，那里四面是山，比较隐蔽，周围好几十里。他们修上了城墙、碉堡、电网，布满警卫、岗哨，把那里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恐怖魔窟。一九四一年以后，美帝国主义的特务也插手进来了。国民党派了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国代表鲁斯谈判，签订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决定在重庆建立一个“中美合作所”，作为美帝国主义直接操纵的特务机关。美帝派遣了上千的特务来到重庆，有些是以教官的名义出现的，教国民党特务搞情报、爆破、射击等等。开办了各种特务训练班，一共办了七十多期，全国各地都有。由美国海军情报局派出来的一个少校名叫梅乐斯(Miles)，担任“中美合作所”的副所长。由于梅乐斯执行美帝国主义政策，帮助国民党训练特务，屠杀中国人民“有功”，从少校升到中校、上校、准将，在他离开中国时已晋升为少将了。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为了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做了许许多多反革命勾当。重庆这个“中美合作所”，作为他们的指挥部，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进行特务活动，还派遣特务到解放区去，到敌占区去，所以它是训练特务的中心。与此同时，建立了庞大的现代化的集中营。由于这个集中营设在国民党的陪都，是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它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集中营。又由于它是美国参与合办，因此它又是一个国际性的集中营。这是它的两个特点。

集中营里的刑具、武器、设备到脚镣手铐，都是从美国运来的。集中营里的警犬是从华盛顿用飞机运来的。在“中美合作所”里许多的房子都是分散的，单间的，如杨虎城、张

学良、廖承志、叶挺，他们关的房子都是单间，周围有特务部队看守。除了分散的囚禁点外，中间有两所较大的集体监狱，就是被叶挺将军取名“活棺材”的白公馆和渣滓洞。

白公馆可囚禁一百多人。但这个数字并不是不变的，有些被囚禁的政治犯，经过两三个月就被陆续枪杀了。这些人的尸体有一些被火烧了，有一些被丢在镪水池里，也有一些拿来去饲养了警犬，甚至有一些死了以后埋在花园里，上面栽些花草，还有一些埋在寝室里，再打上三合土，上面放上床。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所以看起来是一百多人，但实际上是远远不止此数，大多陆陆续续被分批杀掉了，只有少数的革命者囚禁时间较长。一般都是进来几个月就被枪杀了。

渣滓洞比白公馆大两三倍，经常关着两三百人。牺牲在渣滓洞的人有多少？现在无法知道。据说有一次，国民党把囚禁在渣滓洞的革命者全部枪杀了，没剩一个。一九四七年后，渣滓洞才重新再关人。在一九四九年底，一晚上一次屠杀当中就牺牲了两百多人。虽然渣滓洞整个牺牲的人数不知道，但从国民党看守的罪行中可推知一些，象杨进兴、徐贵林这两个特务，杨进兴一个人枪杀的革命者就有三百多人，徐贵林枪杀的革命者更多。因此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革命先烈是成百上千，数目是很大的。

这些革命者都是中华好儿女，也是我们的前辈。他们绝大多数的人连真实姓名也没留下，仅有少数人留下他们的姓名和事迹。但是，不管他们留下姓名也好，没有留下姓名也好，都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由于敌人在集中营里搞得很秘密，好多人都不知道这里有个集中营，甚至沙坪坝附近的人，也不知道有个“中美合作所”，更不知道里面的情况。这不仅仅是他们用电网、岗哨保卫起来，不让任何人接近，万一有人经过那里，他们都可以不加警告地用枪扫射，所以群众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在一九四一年，那时中美合作所还未完全建成，歌乐山国立第六中学的四个中学生从山上下来，从那里经过，误入了这个禁区，被敌人发现，把四个学生抓起来，经过严刑拷打，知道这几个学生并不是侦察他们的情报，完全是无意的。但是，他们怕这几个学生出去后泄露机密，就判决了这几个学生终身监禁。从一九四一年一直关到一九四九年，十三、四岁，到二十几岁。解放前夕，这几个中学生与先烈们一道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

每一个革命者被关进“中美合作所”后，在身体上、精神上所受到的摧残、痛苦，不用讲，大家都是知道的，因为敌人是那样的残暴。而值得讲的是，那些革命者是怎么对待当时那些考验的？我想先讲讲叶挺将军在监狱中的情况。

叶挺将军是新四军的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最初，敌人把他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后来押到息烽，押到桂林。在桂林，叶挺被关在漆黑的山洞里，根本见不到阳光，长期的住在潮湿的山洞里，不让他看报，什么东西都不让他看，希望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来动摇叶挺将军的意志。但是叶挺将军毫不动摇。直到抗战结束，毛主席到重庆举行谈判，最后敌人才把叶挺将军、廖承志同志释放了。

叶挺将军离开监狱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他一离开监

狱，就到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去了。当时叶挺是身上仍然穿着新四军那套军服，这套军服已经破烂不堪了，袖子已破成布条了。他把这套破军装珍惜地穿在自己身上，洗得干干净净，保持着一个人民战士的姿态。到办事处后，叶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中央请求参加共产党。叶挺原来是入了党的，被捕后自然就脱党了，现在要求恢复党籍。几天后，党中央给叶挺回了一个电报，同意吸收叶挺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叶挺将军请求加入党的电报和党中央的回电，当时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上，这给了全国人民很大的鼓舞，也给了敌人一个狠狠的打击。不幸的是，他三月间离开监狱，四月八号乘飞机去延安，途中飞机失事牺牲了。虽然叶挺将军已经牺牲了多年，但叶挺将军在狱中的高尚情操，英雄事迹，对我们青年永远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锢禁世界里的民族精英

下面讲一讲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车耀先的情况。他们二位是一九四〇年在成都被捕的，当时，罗世文的身份是公开的，他是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的代表，兼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的社长。他被捕以前，国民党曾警告过罗世文，要他不要积极活动，停止抗日，停止党的工作，否则要遭到逮捕。但是罗世文态度鲜明地回答了敌人，他说：“我的身份是共产党员，不会离开成都，如果你们还有一点抗日之心就不应该逮捕我了；如果你们逮捕了我，那就证明你们破坏抗日，是在人民面前犯罪。”不料过了不久，罗世文同志就被捕

了，车耀先同志也被捕了。捕后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随又押送到息烽关了许多年。到一九四六年他们又被押回重庆，关进白公馆。

罗世文和车耀先在息烽监狱里，做了不少的工作：清理了党的组织，整顿了党的队伍，把被捕的革命者一一进行了审查，了解了情况，把他们组织起来，在监狱里与敌人进行了许多斗争，还与狱外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罗世文、车耀先同志还在监狱里作了许多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在重庆解放前夕，“中美合作所”的革命同志越狱时，白公馆一个看守员就起义了，交出了钥匙，帮助一批革命者逃出去。这就是他们工作留下的结果！

罗世文、车耀先在息烽监狱时，为了培养狱里的同志，改变监狱里不准看书、看报的状况，罗世文领导同志们进行了斗争。首先向敌人提出：我们是革命者，所谓的政治犯，我们是爱国，并没有什么罪过，你们没有权利不给我们看书看报，要求敌人在监狱里办一个图书馆。经过绝食斗争，迫使敌人接受了条件，在监狱里开了一个图书馆。当然敌人不可能花钱买书给共产党看，更不可能花钱去买共产党的书籍。监狱里的党组织提出：要求把敌人逮捕革命者时没收的书供人阅读。敌人怕那些书里有马列主义，要进行审查，审查人手不足，狱里的同志也来帮助敌人审书。敌人审查书的条件是：凡马列主义的书刊都不能看，赤色的书也不能看。那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赤色的呢？敌人有些东西清楚，有些并不清楚。他们认为鲁迅、高尔基的著作不能看，红色封面书面是红的也不能看；书名带“红”字或“马”字的不

• 6 •

能看，闹了不少笑话。小说《红楼梦》、文法书《马氏文通》因为犯讳都收掉了。可是有许多书，他们没有收掉，如《哲学词典》，他们认为大概是一种字典；还有一些邹韬奋的著作，如《读书偶译》、《萍踪寄语》等，都未收掉。其实，这些书在当时是禁书，监狱外面买都难买到的。因此大部分的书保存下来了。另外一部分书，在摆在地上审查时，就被我们的同志悄悄地藏起来了，如：《党章》、《联共党史》、《整风文献》，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

图书馆成立以后，车耀先就自告奋勇当图书管理员，敌人同意了。这个图书馆，恍眼一看，是保管得不好的，书在屋里堆的乱七八糟，主要是不让敌人进图书馆，这样，我们的同志看书就方便了。实际上，这些书籍保管得很好，有些烂了的书籍，还把它重新装订；有些撕破的地方，则用纸补上重新抄写；有许多书的扉页上都写上了：“文优纸劣，特请珍惜。”说明纸质虽不好，但文章内容却是很好的。

通过这些书籍，在监狱里就可以办学习班了，可以学习马列主义了。囚禁在监狱里的革命者，虽然他们个人随时都可能牺牲，但是，他们还活着，就不会停止学习，准备着有一天从集中营里跑出去后，能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敌人一直妄想动摇罗世文、车耀先的革命意志，屡遭失败仍不甘心。最后一次，一九四六年五月端阳，敌人请罗世文、车耀先吃饭，特务带着手枪把客人押到餐厅，一些高级特务热情应酬，说什么：“今天是端午节，每逢佳节倍思亲，特请你们来团个圆，摆谈一下……”桌上是丰盛的酒席，罗世文对敌人说：“今天的酒席倒很丰盛，但吃的都是中国人民的

血汗，我们不愿拿人民的血汗来养肥自己的肚子，你们请吧！”说完以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敌人完全绝望了，这之后不久，敌人就将他们秘密地枪杀了。

罗世文发现不久将要牺牲，他就争取时间给党留下了一封短信，信是这样写的：“决心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希望你们保重、奋斗。”车耀先在息烽监狱时，写了长达万言的自传，以“谦、勤、劳”三字告诫他的女儿，他说：“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这些思想今天看来仍然是闪闪发光的。

罗世文在离开白公馆走向刑场时，还高声朗诵了一首创作的旧体诗：“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感情深沉，文采凝练，洋溢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蔑视敌人的必胜信心。

革命的硬骨头——许建业

重庆地下党搞工人运动的工运书记——许建业同志，牺牲前也关在这里。当时重庆的工业比较发达，特别是军事工业比较多，那时我们党的组织在兵工厂、在工人里头，有很多活动，也有了党的基层组织，许建业被捕以后，敌人很希望从他的嘴里得到很多材料，因此用了许多毒刑去折磨他，迫使他把党的秘密泄露出来。但许建业同志什么也没有讲。

敌人使用的刑罚很多，中国式的、外国式的、中古时的野蛮的刑罚，一直到最现代化的美国的科学。电刑，周身通电；测谎器，据说可以测验你讲的话是真是假。敌人甚至用

催眠术，用催眠使人处于朦胧状态的办法，都没有起到敌人想达到的目的。

当然也有一些残酷的刑罚。如把辣椒水灌在一个橡皮球里边，把一根橡皮管，塞进你的鼻孔里头，然后一压这个橡皮球，让水直接射到你的肺里边去。许建业也经受过这种刑罚的考验。

许建业受了很多刑罚，始终没有告诉敌人任何一点东西。他告诉敌人：“你们用刑，如果我讲了一个字，不算好汉；我呻唤了一声，也不算好汉。”敌人威吓许建业：“如果你不讲的话，我们有四十八套刑罚来对付你！”许建业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有八十四套，也损伤不了共产党员的一根毫毛。”敌人绝望以后，很快的就把他枪杀了。他牺牲是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四月份逮捕，七月份就枪杀了，三个月。其他革命先烈，都是秘密处死，焚尸灭迹。而对许建业同志他们则采取公开游街示众后枪杀的方式，妄图以此来镇压威胁人民群众。

枪杀许建业那天，敌人用十轮卡车，把许建业同志押上刑车，刑车通过大街上。事前还贴了很多布告，好让人民群众来看，看国民党枪杀共产党人。

许建业站在囚车上，毫无惧色地大声讲演，他告诉人民群众：人民解放军正在大踏步的前进！两三年内，西南就要解放，全国人民就要解放，反动派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他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成千上万的群众，跟在刑车后面，想多听一点。街头上的交通堵塞了，后面的群众跟着上来，前面的群众不让，把刑车就夹在群众里头。敌

人不但没有起到镇压群众的作用，相反的却宣扬了共产主义真理。

许建业牺牲的消息传到监狱里去了，监狱里的同志一方面很悲痛，另一方面也觉得很兴奋。有些同志写了诗来追悼许建业同志，其中一首写了这样的句子：

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
争睹英雄万巷空。

这里讲的是许建业牺牲时候的表现，受刑的表现。这是他最后思想境界达到的高度。他达到这个高度，也有个成长的过程。

许建业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入党，入党以后，被党组织派到北碚天府煤矿工作，他的职业，是在天府煤矿作个小职员，白天上班，晚上作党的工作。那时，他很年轻，工作条件是艰苦的、秘密的，工作对象是工人。工人住得很分散，每天要走几十里路，去进行工作，很不方便。有时不但要到工人家里去，而且要给群众解决许多具体问题。

许建业很关心群众的生活，常常有的工人病了，他就帮助请医生治疗；哪家工人没有米了，他就用自己的工资买了米，晚上背到工人家里去。

其中有个井下工人，并不是党员，是个群众，受了很多苦，但跟资本家作斗争很勇敢。可是他得了吐血病，病得很重，在临死之前，想见见老许。老许想，带什么东西去看这个吐血、快死的工友呢？他想起这个工人很苦，在得病以前

就想吃肉，但都吃不起，于是他马上买了一点肉，四川叫烧腊，给工人送去。那个工人一看老许去了，而且带着东西，抓住他的手流泪。这个工人并不一定知道，许建业是个共产党员，只知道他是个好人。

就由于这样工作的结果，老许在群众中间威信很高。这种威信当时很重要，没有威信群众就不相信你，就不能把工人组织起来。这样，党的组织在工人中逐渐的慢慢地发展起来了，党的组织越发展，工作就越重。后来，老许为了工作方便，干脆把自己的家搬到矿里简便铁路的火车站去。后来，许建业就干脆把火车作为他自己的流动宿舍。当然这种日子是很苦的，热天好一点，冬天就很冷了，但他觉得这种工作很愉快。特别是在月明星稀的晚上，工作做完了，躺在火车上，仰望着辽阔的天空，觉得很舒畅。他喜欢唱《国际歌》，火车在奔驰，轮子不停地在“哧吭”“哧吭”的响，他就放声歌唱。火车司机有一些是靠近党的群众，有一些是自己的同志。有时他唱，火车司机也跟他一起唱。一起摆谈，谈自己的理想。

这样工作了两年，“皖南事变”以后，白色恐怖严重，在天府呆不下去了，许建业被调出了天府。

当时组织上给许建业讲：准备派你到兵工厂去工作，但是，你一定要有个社会职业作掩护，党组织一时解决不了，要你自己想办法。

这样一来，对老许是个新考验，他就把找职业，作为党给他的任务来完成。他是初中文化程度，在报上发现，国民党有个经济机关招考练习生启事，条件是高中毕业。老许

抓紧时间，日夜准备，把报考作为完成党的任务，终于考上了。

许建业进了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工作表现很好，得到了上司的提拔，以后又给他分配了宿舍。国民党机关的宿舍，一般情况下，特务是不进去的，除非你有重大嫌疑，因此比较安全。有了房子，为工作提供了方便，还可以保护其他同志，没有地方住的，可以到他家里去住。

当时老许没有结婚，有些同志就劝他趁现在生活环境好一点找个对象。他说：“这个是暂时的，我的目的，并不是安心在这个机关，搞什么工作，而是为了给党作工作方便；如果党的工作需要，我随时准备离开。至于结婚讲恋爱，我岁数也不大，等到解放以后再说。”他在天府煤矿的时候，人家给他介绍对象，他也是这样说的。一直到他被捕、牺牲，他都没有结婚。

上级党组织考虑，要在重庆和贵阳之间，建立党的联系。地下党的联系，不是发电报，需要人跑腿，叫做联络员。联络员的条件要求比较高，要对党忠诚，立场坚定，还要有相当的社会经验等，当时考虑到条件比较合适的是他许建业。党的上级征求他的意见说：“本来党组织想调你去搞重庆和贵阳党的联络工作，但又考虑到你有一个这么好的职业，同你商量一下。”老许回答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在这里工作，也是为了组织的需要嘛！现在既然需要作其他工作，我明天就离开，宿舍那一套，不要了。”

这种联络工作都非常机密，社会职业一般不由自己找，由党组织来安排。党组织找了两个职业让他选择：一个是去